

中国语言学百年

语文现代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百年回顾

史有为

语言理论

近代汉语研究

蒋绍愚
赵世开

杨荣祥

现代汉语辞学百年回顾
文化语言学研究 陈建民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

王宁 万艺玲

音韵学

唐作藩 耿振生

中国语言学——一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

胡明扬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现代汉字研究

苏培成

北京市语言学会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中国语言学百年丛论

(1900 ~ 2000)

北京市语言学会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语言学百年丛论/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 重印
ISBN 7-5619-1255-2

I. 中…
II. 北…
III. 汉语史—文集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0690 号

书 名: 中国语言学百年丛论
责任印制: 汪学发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http://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48 /3591 /3651
编辑部 82303647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 /3908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75
字 数: 508 千字 印数: 100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619-1255-2 / H·03081
定 价: 48.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82303590

目 录

中国语言学 —— 一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代序)	胡明扬	(1)
现代汉语文字学研究的回顾	赵平安	(10)
音韵学	唐作藩 耿振生	(37)
训诂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	王 宁 齐元涛	(50)
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	宋绍年 郭锡良	(67)
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语音学	周同春	(85)
现代汉字研究	苏培成	(92)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	王 宁 万艺玲	(101)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百年回顾	史有为	(118)
文化语言学研究	陈建民	(145)
现代汉语修辞学百年概观	李裕德	(168)
近代汉语研究	蒋绍愚 杨荣祥	(182)
语文现代化	费锦昌	(213)
汉语方言学	金有景 金欣欣	(237)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孙宏开	(258)
语文教学研究百年概述	鲁宝元 陈亚丽	(281)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缪小放	(296)
语言理论的研究	赵世开	(308)
标点符号研究	苏培成	(315)
中国现代语言学参考文献		(323)
后记	北京市语言学会	(343)

中国语言学 —— 一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代序）

胡明扬

回顾历史要求全面，评价要求公允；但是，要真正做到全面和公允很不容易，特别是涉及当代的历史，在历史的烟尘还没有散尽，个人的局限和参与带来的偏见还不可能完全克服的时刻，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允许有不同的侧重面、允许有不同的观点，最终也许会勾画出一幅比较全面、比较公允的历史画面。

历史的总结不是为了别的目的，为的是“以史为鉴”，为的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更好地了解现在和规划未来。

从1898年《马氏文通》的发表到今年1998年恰好整整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从宏观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传统的中国语言学逐步融入国际语言学洪流的一个世纪，而且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中国语言学在这一百年里面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怎么划分这些不同的阶段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首先是中国语言学内部不同学科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没法一刀切；其次是各人的看法可以很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借鉴社会政治历史的分期，因为学术发展的历史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历史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往往涉及各个领域，这样的分期也许会比以某一个领域的发展进程为依据更方便，更具有普遍性。如果可以依据社会政治历史来分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98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第二个时期从1937年到新中国建立，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建国以后到目前。一个时期，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再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1898 ~ 1937 五四时期

这一时期是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学的开创时期，称之为“五四时期”仅仅是为了方便，同时也是因为这一个时期总的来说是在学术界处处充满了“五四”精神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语言学大师，在不同领域内为中国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古代汉语语法领域，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揭开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学的序幕；接着就是现代汉语语法领域有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1920年初版，1924年四版；刘复的主要贡献不在语法领域，但是在这部著作中就用数学公式来表示汉语的基本句式，还运用了转换分析法分析语法和语义，应该说在理论和方法上有独创性，而且在世界范围也是“超前”的，因此有必要提一下）；语音领域有刘复的《四声实验录》（1924）；方言领域有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罗常培的《厦门音系》

(1930)、《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 修辞领域有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有李方桂的《广西凌云瑶语》(1930)、赵元任的《广西瑶歌记音》(1930); 古文字领域有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1915), 王国维的《毛公鼎铭考释》(1916)、《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等, 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1923), 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6)等, 唐兰的《殷墟文字记》(1934); 音韵学领域有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3), 罗常培的《知彻澄娘音值考》(1931)和钱玄同的一些著作, 另外,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作译成中文出版(1937), 中译本对原作引书失误之处加以纠正和补充, 对原书的某些结论加了评注, 因此不是一本单纯的译本, 并且这本书对中国历史音韵学和方言学的影响之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1918年制定“注音字母”, 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 1936年《国语词典》出版, 这是现代汉语规范化领域的几件大事。

这一时期从事语言研究的人并不多, 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人更少, 但是他们的成就卓著, 影响深远, 很多著作成了近代中国语言学的经典著作, 很多人成了有关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绝大多数语言学家都是学贯中西、古今兼通的大学者, 因此他们才有这么大的成就。像赵元任不仅写出了在调查方法和记音的精确程度方面至今都还没有人能超过的《现代吴语的研究》, 制定了沿用至今的“五度制标调法”和奠定了《方言调查字表》的基础, 写出了成为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经典论文的《音位标音的多样性》(1934), 还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卖布谣》和《教我如何不想他》, 甚至还在1916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简直让人无法相信的一篇科技论文《飞行器黑夜落地法》!

回顾这一时期的成就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反思的地方,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很不够, 不少人还往往把这一时期贬为“模仿时期”。其实, “五四”以后的中国学术界无处不存在西方学术的影响, 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语言学界也不例外。一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 也许文字学、训诂学除外, 各个时期都是在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仅仅是不同时期借鉴的西方语言学流派有所不同而已。前人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就贬之为“模仿”, 今人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就誉之为“繁荣”和“发展”, 这就有欠公允, 至少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如果客观、冷静地来评价, 也许正好相反: 这一时期语言学家深厚的学术基础、广博的知识结构、开拓性的工作能力、谦逊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恐怕后人很难企及, 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二、1937~1949 抗日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前一时期的继续, 不少研究工作仍然具有开创性质, 如罗常培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语言和文化》正式出版是在1950年), 吕叔湘对近代汉语的研究(正式结集出版《汉语语法论文集》是在1955年)。这一时期主要人物的教育和知识背景也跟前一时期的人相近, 知识面比较宽, 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又大多是留学生, 往往一人精通多种外语。由于抗日战争爆发, 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移居国外, 留下来的人

大部分到了西南边陲,生活和工作条件很艰苦,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作出了很多贡献。罗常培在这一时期带领一批学生调查研究了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著名的专家,另外他还培养了一批从事汉语历史音韵和方言研究的专家。罗常培在培养我国语言学人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到这一时期的后期,“罗门弟子”大都已脱颖而出,一时成了我国语言学界和语言学教育界的中坚。

1938年到1943年以陈望道、方光焘为主开展了一场“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943)。这次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汉语词类问题。参加这次讨论的大多数人的语言学理论水平是和当时的国际水平同步的,他们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和布龙菲尔特的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都很熟悉,因此他们最终的结论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词类是聚合类,而聚合类只能在组合关系中求得,组合关系则既要考虑短语组合功能,又要考虑句子成分功能。在这以后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中国语法理论》(1944~1945),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相继出版。这几部语法著作在运用西方新的语法理论,发掘汉语语言事实和汉语特点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的“动词中心观”和“动词的方向”的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比法国泰尼埃尔的“动词中心论”和动词的配价理论还早17年,可惜长期没有受到重视;王力在发掘汉语语法特点方面的贡献则是众所周知的。

综观这一时期的成就,在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历史音韵研究领域中结合最为成功。但是由于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不稳定也的确从客观上制约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三、1949~ 新中国建立以后时期

这一时期也许需要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7年的建国伊始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57年到1978年的低谷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的改革开放阶段,第四阶段是1990年以来的多元化和理论探索阶段。

(一) 1949~1957 建国伊始阶段

这一个阶段的特点总的来看是:语言学界的重大活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地围绕着以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三大任务为中心展开的。1951年6月6日起《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个既“空前”又“绝后”的“学一点语法”的高潮,随后又有领导地制定了“部颁”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具体由张志公主持制定),并且在中学普遍推行汉语语法教学,史无前例地推广和普及了语法知识。

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同年2月起分批在全国报刊和其他印刷品上推广。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年1月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始对异读音字分批进行审音,1963年公布《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58年2月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国务院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先后由吕叔湘和丁声树任主编，到1959年底完成初稿，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但由于十年动乱的干扰，直到1977年才正式出版。

为了更好地推广普通话，在1956年~1958年在全国进行了方言普查；为了给还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和改革已有的少数民族文字，又在全国进行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普查工作。为了进行规模这么巨大的语言调查工作，语言研究所从1956年起举办了多期普通话语言研究班，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和方言研究的骨干，中央民族学院则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骨干，同时，北京大学等几所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增设了语言专业，培养了一大批语言研究骨干。五十年代的这些具体工作既锻炼了一大批青年语言工作者，又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搜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以及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普及，中国语言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关于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论述使中国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学术讨论在一个短时期内也比较活跃，如围绕词类问题、句子问题、复句问题、语言和言语等问题，都曾展开过比较热烈而相对宽松的自由讨论。虽然这些讨论并没有解决多少具体问题，但是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却都是一些长期解决不了的关键问题，因此可以说为此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并且开列了一份具体研究项目的清单，这也是很大的收获。

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组织领导各项调查工作、培训人员和研究工作中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在推动政府支持语言事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在学术领域内，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罗常培和吕叔湘两位所长的领导下发挥了核心作用。

回顾这一阶段，中国语言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后备人才，为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1957年的政治运动完全改变了中国语言学的命运，到十年动乱时期，所有的文化事业全遭扼杀，那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此以前由于“一边倒”，中国语言学就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跟国际语言学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发展失去了联系。另一方面，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拔白旗”等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混淆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伤害了不少对中国语言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语言学家，而更为不幸的是，事事处处“一刀切”，不是“绝对正确”就是“绝对错误”，并且不容许有不同意见的思维定势也逐步影响到语言学界，学术讨论带上了“大批判”的色彩，以后真正自由的学术讨论就没有可能了。这在当时关于汉字改革和词类问题的讨论中都有明显的反映。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都难以消除。

语言规划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实施这样一项工程难度更大，不单纯是一般的社会舆论宣传工作和行政工作，还势必牵涉到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对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估计不足，热情有余而研究工作没有跟上，

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这就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也许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第二批简化汉字方案》的仓促公布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失误是 1953 年的教育改革改变了高等学校通才教育的方向，改为专业教育，而专业教育的特点就是忽视基础知识教育，专业越分越细，知识面越来越窄，国学根底越来越单薄，外语能力也越来越差，再加上闭关锁国，跟西方世界隔绝，语言学人才的局限性越来越大，这实在是一个在短时期内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二）1957～1978 低谷阶段

从 1957 年“反右”开始，不少有成就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知识分子正常的研究工作已经很难进行下去，语言学家也不例外。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所有的学术刊物全都停刊，即使有了研究成果也没有地方发表。但是不少语言学家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还在默默地耕耘。年轻一代的语言学家也在默默地成长，个别人还利用了这段夹缝中的时间刻苦学习和钻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等待时机，脱颖而出。不过这一阶段付出的艰辛劳动要开花结果，中国语言学真正复苏却要等到二十年后的 1978 年，因此这一阶段的某些重要成果放到下一个阶段去一并叙述也许更为合适。

（三）1978～1990 改革开放阶段

这一阶段跟第一阶段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国家统一组织领导的语言工程和语言研究工作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尽管曾经搞过两次全国性的规划，但是都不了了之，影响不大。这一阶段的语言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在各个高等院校、各个科研单位分散进行的。1979 年吕叔湘发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对以往 80 年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总结，而这部著作最后一部分对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的语法体系的详细介绍，预示了一个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阶段即将开始。

早在 1948 年赵元任在他的《国语入门》中已经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汉语语法体系，到 1968 年的《中国话的文法》就更为完备了。《国语入门》的理论部分在 1952 年由李荣翻译，改名《北京口语语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2 年到 1953 年以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名义在《中国语文》上连载的《语法讲话》（正式出版时署名丁声树等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也已经明显地反映出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影响。1956 年朱德熙在《语言研究》上发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可以说这是国内第一篇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有影响的文章。在这以后朱德熙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有份量的文章，成功地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充分中国化了，并且还有所发展，同时他还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掌握和熟悉了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学生和青年。这就为到八十年代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最终在中国语法学界成为主流学派奠定了基础。

传统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语言学家本人丰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见识，很多结论也许事实上是正确的，但却是完全主观认定的，缺乏严密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意见分歧，就会发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任何一

门学科开始建立起本学科的方法论是学科发展趋于成熟的标志。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语言学的发展史上第一次为语言科学建立起一个可以客观论证的,经过一定训练就可以操作的,相对完整而又比较科学的方法论体系。这就使语言科学不仅更为科学,而且也更接近大众,使更多的人能参与语言研究工作。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过长期酝酿,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终于为现代汉语语法学界的多数人所接受和掌握,从而开始了一个以广泛、深入描写语法事实为主的阶段,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为可喜的是壮大了语言研究的队伍,为今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这一阶段发表出版了众多的语言研究成果,一系列方言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著作也都是在这一阶段出版的,至于在杂志上发表的各方面的文章更不计其数,其中绝大多数是描写具体的语言事实的,相对而言理论探讨比较冷落。这固然跟老一辈语言学家在这一时期大力提倡描写语言事实有关,不过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西方语言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一些现代主要语言的语言事实也已经进行了几百年深入全面的描写和研究,所以到了二十世纪,研究的重点转向理论总结和再创建是十分自然的。但是现代中国语言学还非常年轻,还来不及对汉语的语言事实进行深入全面的描写和研究,我们还需要“补课”。

这一阶段现代汉语在方法论和具体语言事实的描写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还出版了好几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以及不少专题研究文献汇编性质的著作;古代汉语在上古音研究、甲骨文和金文语法研究以及专书研究领域有所突破;近代汉语研究的队伍初步形成,对近代汉语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对近代汉语时期的语汇、语音、语法进行了研究,初步填补了汉语史的某些缺环;古文字学研究由于竹简、帛书、战国文字的大量出土和甲骨、金文的系统整理取得了巨大进展;音韵学对《切韵》和《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掘了一批以前没有研究过的韵书,还对甲骨文和金文时代的汉语音韵进行了初步探索;方言学研究已不限于音系描写,开始逐步扩大到方言语汇和方言语法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成长,整理出版了大量调查研究成果;中国传统语言学也有了某些复苏的迹象。社会语言学研究、文化语言学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是在这一阶段开始的。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在中文信息处理这一跟高科技密切相关的领域内基本上解决了以前认为无法解决的汉字输入问题,为中文信息处理和汉语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等一系列问题打开了通道,同时经过多年攻关,外-汉和汉-外机译系统的研制、语音自动识别和语音人工合成的研究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五十年代初期,全国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不满百人,而且还都已年过半百,中青年语言研究工作者的数量更少,也就几十人,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倒金字塔;可是到八十年代,语言学的队伍空前壮大,少说也有几百人。因此,有人称这一时期为中国语言学的繁荣期,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对这一阶段的成就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看到跟前人取得的成就相比,跟国外语言学目前达到的水平相比,都还有很大差距。如果过高估计这一阶段的成就,甚至认为到此已经差不多了,那就更加有害而无害。

这一阶段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组织领导,各个领域、各个分支学科、各个单位各行其是,这就不能互相促进,重复劳动也在所难免。如果能够统一

协调,互相合作,也许会取得更大的具体成果。其次是由于五十年代起高等学校推行的专业教育,严重影响了新一代语言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基础,因而语言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应该产生的严重分割现象:现代汉语研究和古代汉语研究分道扬镳;语法研究和语汇研究、语音研究分家,现代汉语研究和方言研究的联系也并不密切;传统的音韵、文字、训诂研究又是另一回事;汉语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从总的情况来看也是各搞各的;外语教学界的语言研究更和汉语研究互不相干。这种情况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语言学拉开了和国际语言学发展的距离。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但是要真正赶上国际语言学的发展潮流,要产生像赵元任、罗常培那样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学家,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后还有一个缺陷是早期“大批判”留下的后遗症还没有完全消除,“要么绝对正确,要么绝对错误”,因而容不得有不同的意见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也还没有完全克服,所以真正自由的、平心静气的学术讨论还难以顺利开展。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应该大力提倡“宽容”,要宽容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学术观点。要真正促进学术繁荣,开展自由讨论,“宽容”和“谦逊”是绝对必要的。

(四) 1990~ 理论探索和多元化阶段

经过九十年的探索和对汉语、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描写和研究,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语言事实方面的资料 and 知识,这就为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创造了条件。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在现代汉语语法领域开始了根据汉语这样一种非形态语言的特点尝试从语义着手,然后在形式上求证的语义·语法范畴的研究,还有人在当代语言学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对汉语语法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近年来很重视理论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邢公畹提出了确定同源词的“语义学比较法”,对确定非形态语言的同源词作出了贡献;另外,有人对藏缅语族语法范畴和相应的形态进行了综合的历史比较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且某些成果已经对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尽管这些根据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事实进行的理论探索还是很初步的,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这毕竟是中国语言学的重大转折,也是中国语言学今后发展的方向。我们不能永远只是追赶西方语文学的进展,而应该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为世界范围语言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国内开始逐步受到国外五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计算机专家对生成语法和国外其他形式语法很早就比较熟悉。他们一直在尝试运用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来解决机器翻译和自然语言理解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他们较早就注意到了“格”语法和相关的配价理论在句子的语义解释方面的作用,还结合现代汉语进行了研究。汉语语法学界也有一部分人开始研究动词的“向”和配价理论,个别的人开始运用生成语法的理论和方法试图解决一些现代汉语语法的疑难问题。但是,可能是由于知识结构方面的问题,汉语语言学界接受形式语法有一定困难,所以迟迟没有形成热潮。至于当代国外另一个主流学派,功能学派的功能语法,特别是三个平面的理论,由于更接近传统语法,比较容易接受,一度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并且也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不过从总的来看,多元化的趋势还刚刚起步,多元化的局面还并没有形成。

1990年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一年，董振东、张德玲研制的英-汉机译系统 Transtar 通过国家技术鉴定，并且实现了商品化。同年，电子工业部高级工程师吴蔚天研制的“HY-1型汉-英机译系统”通过技术审议。英汉机译系统不一定需要先对汉语进行形式分析，而汉英机译系统却必须先对汉语进行形式分析。吴蔚天研制的汉英机译系统在现代汉语语法自动分析方面有所突破。他采用的是以黎锦熙的语法体系为基础的“人句辨品”和“完全语法树”的系统。这些成果表明我国不仅基本上解决了汉字输入问题，而且在机器翻译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语义研究不再是语言研究的禁区，语义研究的队伍迅速扩大，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但是语义热在少数人中间引发了排斥形式研究，主张进行纯语义研究的倾向。不过这也不必过虑。在语言学史上一个阶段偏重意义，另一个阶段偏重形式，这可以说是常规，是正常现象，而且正是这样一正一反，相辅相成，才能不断螺旋型地向上发展。语言有形式和语义两个方面，如果是从语义着手，然后在形式上求证，这跟从形式着手，然后在语义上求证是同样的道理，在理论上都是站得住的。不过纯语义分析跟纯形式分析是一样的，都有所偏颇，都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国外七十年代以后在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方面取得成功的生成语法和功能语法都是以传统语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同时也都继承了结构主义描写语法的形式分析方法。因此，既不能抹杀传统语言学在语义研究方面的成就，也不能抹杀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在形式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不能抹杀形式分析的重要性。在国外，当代的语义学和语义分析都经过了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和生成语法的“洗礼”，不是完全不考虑形式的。我们却没有经过这样的“洗礼”，一强调语义分析，很容易就回到传统语言学的“内省”道路上去，这就令人担忧了。对任何一个学派经过实践和时间考验的成果都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也不宜绝对化。后人的成果说到底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收并蓄是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多元化也许是学术发展的最佳方式，而“定于一尊”和绝对化永远不会有什么好处，而只能阻碍学术发展。

过去语言学家研究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心目中应用他们研究成果的对象都是已经掌握这些语言的人，但是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却改变了这种情况。语言研究要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就要考虑很多过去没有考虑过的问题，研究很多过去没有研究过的细节。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研究工作更促使我们考虑许多过去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公正而强有力的验证手段。因此积极参与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仅是改革开放时代和信息时代语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而且也会大大促进中国语言学的进一步现代化。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吸取和借鉴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以及改进研究手段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防止盲目照抄照搬，而应该大力提倡结合汉语实际，充分消化，做到彻底的中国化。前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凡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语言学家都在中国化方面下了极大的工夫，最终让绝大多数人根本感觉不到这些理论和方法最初是从国外引进的，往往还以为从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传统。但是目前有些迹象令人担忧。不少人并没有直接阅读国外的语言学文献，而只是通过别人的翻译或第二手的介绍来理解国外一些语言学流派的理论观点和名词术语，结果往往只是根据中文翻译的用字去理解，那样就很可能

自己理解的完全不是原来的意思，如果再由此生发开去，那就更离谱了。还有不少人现在不仅不读国外的论著，而且也很少读国内前人和同行的论著，拿起笔来就写，有一种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这对真正做学问是没有好处的。在一个转轨阶段似乎特别需要处处谨防“出轨”。不过这些现象无碍大局，中国语言学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语言学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现代汉语文字学研究的回顾

赵平安

第一节 引言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文字学，是以研究汉字形体为主，兼及字形与声音、语义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它脱胎于传统的“小学”，经过清末民初的酝酿，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趋于成熟。

“小学”本为贵族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机构，由于教学内容中有与文字学有关的“六书”，所以用“小学”代指文字学。从《汉书·艺文志》看，当时的“小学”大致相当于文字学。到了隋唐时期，“小学”的内涵逐步扩大，又包括了音韵学和训诂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来。

清末民初，一些学者走出国门，把西方现代语言学思想带进来。章太炎1906年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国粹学报》2卷12、13号），提出传统的“小学”应称之为“语言文字之学”，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另一方面，清代晚期，由于地下资料不断出土，加之长期研究经验的积累，传统的金石铭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吴大澂、孙诒让等人在识字方法、古书校勘以及像《说文》“古文”之类关键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正是在西方语言学思想和传统金石铭刻学研究的推动下，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文字学应运而生了。这标志是唐兰1934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北京大学手写石印本）。书中论及古文字学的对象、任务、原理、方法、规则各个方面，虽名曰“古文字学导论”，实际勾画了汉语文字学的理论框架。它确定文字学研究对象只限于形体，对于把文字学从“小学”中剥离出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清末民初到三十年代是汉语文字学的形成期，那么，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可以看作汉语文字学理论体系不断补充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著作可以唐兰《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为代表。唐书对古代文字的起源和文字的发展演化，论述极详。梁书重视文字与语言关系的探索，在汉字结构和流变、规范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蒋书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由篆到隶的演变。七十年代以后，汉语文字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看作汉语文字学的突破期。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裘书不仅对过

去的研究有系统的总结,而且对汉字性质、起源、发展演变、结构类型等有独到的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汉语文字学研究分为若干具体的领域,如一般性的汉字研究、《说文》及其他字书研究、古文字研究、俗文字研究。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对汉语文字学研究作一简单回顾。

第二节 一般性的汉字研究

一、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一般说,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并且从属于汉语。但研究结果同时表明,汉字对汉语有着积极的一面:1. 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对维系汉语的统一发挥了有益的作用;2. 汉字记录汉语,为语言的提炼、加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 汉字对汉语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有正面影响;4. 汉字特有的字形特点,从各方面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汉字也确实存在着与汉语不相适应的一面。如汉字作为“语素—音节文字”,与汉语多音节单纯词不相适应;汉字原则上—字—音的制度,与汉语的“合音”(如“诸”代表“之于”或“之乎”)“慢声”(如“钲”为“丁宁”)不相适应。汉字有时不能准确地记录汉语,如普通话中不少有表达作用的口语词“有音无字”。有些音节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一些变化,如轻声、儿化等,在文字上不能准确表示出来。

五六十年代,受文字改革大环境的影响,一些学者曾片面强调汉字与汉语不相适应的一面。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汉字从古迄今经过了近六千年的变化,至今还独一无二地为今天的汉语服务着,虽有严重缺点,但不得不承认仍有基本的适应性。”(李公宜《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看汉字改革》,载《语文论丛》1,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张志公(《汉字与阅读》,“世界阅读协会第十一届年会”(香港)论文,1984。收入《汉语辞章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胡双宝(《汉字与汉语相适应》,载《语文建设通讯》第51期,1997)都持这种看法。他们作了许多具体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 汉字是音节文字,与汉语非形态性相适应;2. 一个音节,写成一个汉字,表示一个语素,显示汉字与汉语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3. 汉字起了有效区别同音语素的作用;4. 汉字和语素的变化相适应,在不断地发生变化;5. 汉字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便于汉语古籍的整理阅读和克服汉语方言造成的障碍。

二、汉字的性质

汉字的性质问题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提出的。当时,一些学者接受了西方有关文字类型划分的理论,把汉字称之为“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徐银来《中国文字的特性》,载《夜光》1卷2期,1931;姜亮夫《中国文字的特色及其在学术上的地

位》，载《青年界》4卷2期，1933；洪秀芳《关于中国文字的本质问题》，载《教与学月刊》2卷3期，1936）。其后，表意文字说一直比较流行，被写入权威的辞典。

五十年代以后，有学者结合世界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汉字为意音文字的说法（周有光《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载《中国语文》1957年7期；曹伯韩《文字和文字学》，载《中国语文》1958年6、7合刊）。

七十年代末，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的同志提出表音文字说。他们认为，“古代汉字，就其文字符号的来源来说，也就是从其构形原则来说，它已经脱离了表意文字的阶段，而进入到了表音文字的阶段。”（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的现状及其展望》，载《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八十年代初，这个研究室的姚孝遂连续发表文章（《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载《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3；《古汉字的符号化问题》，载《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推阐这一观点。

表音文字说一出，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王伯熙撰文指出：“汉字也不是什么‘表音节的表音文字’。汉字字符所记录的并非单纯音节。古老的汉字，其符号体系和形体结构是很有趣、很有特色的。汉字有超方言性，若是表音文字，其超方言的性质就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古代汉字（小篆以前的汉字）是一种象形拼符表词文字；现代汉字（汉隶以后的汉字）是一种方块拼符表词文字。”汉字是“符号拼合的表词文字”（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兼与姚孝遂先生商榷》，载《中国语文》1984年2期）。

表词文字本是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首先提出来的，他把汉字类型称为 Word Writing，即“词文字”（袁家骅译《语言论》360页，商务印书馆，1980）。赵元任进而把汉字称为“词素文字”，或译为“语素文字”。赵书在大陆出版后（赵元任《语言问题》114页，商务印书馆，1980），语素文字说便开始流行起来。有人结合一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的特点，把汉字称为“音节—语素文字”（尹斌庸《给汉字“正名”》，载《中国语文通讯》1983年6期）。

1985年，裘锡圭发表《汉字的性质》（载《中国语文》1期）一文，指出一种文字的性质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他认为早期汉字基本上使用意符和音符，后期使用意符、音符和记号。因为记号来源于意符或音符，所以汉字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意音文字。

1986年，在国家语委召开的“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就汉字的性质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歧见依然严重。大致可以归纳为表意说、意音说、表音说、语素说等意见（《冷静·客观·严谨·宽容——记“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载《语文建设》1986年1期）。

各种不同的意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汉字所能起的表意、表音作用来为它定性的，另一类是根据汉字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裘锡圭指出，要评价这些说法，首先必须分清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如拼音文字的字母）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在这个前提下，他对有关汉字性质的各种说法作了精当的评述（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载《语文建设》1989年3期）。

三、汉字的起源

汉字起源问题关系到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四十年代以前，一些学者利用商周古文字或民俗学的资料，或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汉字起源问题作过有益的讨论。但限于条件，工作未能深入开展。那时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仍是“文字起源于图画”的传统观点。

三十年代以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陆续出土了描绘或刻划的原始符号。这些符号在许多地点都有出土（徐锡台编著《汉字探源》收集较全，可参看。三秦出版社，1994），包括象形和几何形的，大多出现在陶器的特定部位上。关于它的性质问题，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记号（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语文》1978年3期），一种认为是字。认为是字的有各种不同的措词。郭沫若说是“中国文字的孑遗”（《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1期）、于省吾说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1973年3期）、李孝定说是“原始文字”（《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唐兰认为山东大汶口文化陶文属于文字（《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载《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史学》第69期）。对这些陶器符号的认识，大大推动了汉字起源的研究。

1972年，郭沫若指出契刻是古汉字的另一个源头（《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1978年，裘锡圭撰文认为，汉字大概是以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象形符号为基础，并吸收改造了原始社会晚期流行的一些记号而发展起来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这些新知的获得，主要是以陶符为支撑的。

1981年，汪宁生发表《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期），把探索汉字起源的途径进一步拓展。他分析了大量民族学的资料，认为文字是由记事方法引导出来的。在这类研究的启发下，陈炜湛、唐钰明明确提出汉字起源于原始记事方法，特别是图画和契刻等记事方法（《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二十世纪中期，受西方“文字—源说”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汉字也是西方传来的（陆懋德《中国古文数目名考源》，载《燕京学报》第40期，1951）。曾宪通最近通过对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中的有关材料进行详细分析，发现它们从多角度、多层次证明汉字是中国本土上土生土长的（《汉字起源探索》，载《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商务印书馆，1991），为汉字西来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

关于汉字形成的时代，有人认为在夏初（孟维智《汉字起源问题浅议》，载《语言研究》1980年1期），有人认为在夏代（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有人认为在夏商之际（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

四、汉字的字体

汉字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字体，主要有甲骨文、金文、大篆、